

# 初到日本的日子

## —— “就学生”生活琐忆

葛 涛自述

### 一 “出国热”中的我

1988年9月我考入上海大学文学院。虽说成了一名大学生，但却并不满意，总觉得进上大有点委屈自己，在同学、亲戚面前也失了“面子”。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找机会赢回。一个18岁的青年人，对于究竟怎样才算有“面子”，心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

上海当时正弥漫着一股“出国热”，“出国”的念头占据了许许多年轻人的脑海。齐秦的一首歌中有这样两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一颗颗年轻的心满怀着对外部世界的憧憬，渴望着走出国门亲身领略奇妙的外部世界，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一些稍为年长、早已踏上社会的人也渴望有机会出去。与学生相比，他们的目标更明确，想法更成熟。一些人希望出国能给自己和家庭带来转机，另一些人就只想在国外多赚点钱。

与今天相比，80年代末出国要艰难得多。不少国家满怀疑虑地看待申请签证的中国人，设置了不少障碍。对于当时上海的“出国”一族而言，比较热门的目的地有3个，依次为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留学美国是许多年轻大学生的梦想，有人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下真功夫拼英语、考托福。一些人带着“随身听”，整天听英语磁带，晚上还要上夜校补课，以求托福考出好成绩，拿到去美国的“敲门砖”。以辅导托福考试为主的前进进修学院就是从那时起闻名沪上的。不过去美国的难度相当大，一些人于是将目光转向澳大利亚。然而澳洲的高等教育水平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生活、打工条件也艰苦得多。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仍然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目的地。去日本留学则显得比较另类，名声也不太好。社会上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看法，与留日人员的构成以及一些与他们有关的传闻有很大的关系。

所谓赴日自费留学，基本上都是去当地的语言学校进修日语，课程设置为2年，凡具有高中毕业资格、且有一名日本人做担保的，都有资格申请。按照日本法务省出入国管理局的规定，在语言学校就读的称为“就学生”，与“留学生”是两种不同的身份。由于“就学生”的门槛低，结果使赴日人员的构成显得鱼龙混杂，其中既有一心想在东瀛成就理想的莘莘学子，也不乏大量满脑子淘金梦的人。自从80年代中期西方七国执行“广场协议”<sup>1</sup>以来，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泡沫经济迅速升温，截至80年代末已达高潮。日本遍地黄金、赚钱易如反掌的神话到处流传，许多人为之心动。一些真假难辨的信息在上海人中传来传去，比如在日本洗碗一小时能赚多少钱啦、背死人能赚大钱啦，等等。尤其是“背死人”的故事，颇能反映出市民对赴日者的心态：既不无鄙视之意，也不乏羡慕之心。

我当时才19岁，正在念大一，“出国热”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渐渐地我也变得难以自持起来，积极开动这方面的脑筋。何况我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意，一直在寻找能够有所改变的机会。出国留学不啻是一条比较理想的出路。就我的具体情况而言，比较切实可行、且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只有赴日一途。从虹桥机场坐飞机，不到3小时就可以到东京成田机场，实在想家了可以很快地飞回来。我家在横滨有亲戚，帮忙联系学校、找保人还是不成问题的。虽然外祖父母始终不太赞成我的想法，但父母已经默许，加之我执意要去，大人们只得托在

<sup>1</sup>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在广场饭店签署，故称。

横滨的亲戚操办此事。当时有住宅电话的人家不多，开通国际长途的更是聊胜于无，且费用高昂，因此一般都是通过航空邮件进行沟通。亲戚们念在“文革”时期我家因为所谓的“海外关系”吃尽苦头的份上，爽快地答应下来。不久，语言学校联系好了，保人也落实了，我又花了些时间办理休学、护照、签证等事宜。等诸事办妥，父母帮我收拾行装，买了机票，就等待出发了。我去日本的日子定在1990年的9月14日。

## 二 初到日本

1990年9月14日一早，父母和我一起来到了虹桥机场，他们是来送我的。当汽车快要驶进机场的时候，母亲的眼泪已夺眶而出，父亲的眼圈也早已红润。我的心情也非常难受，虽然平日觉得与父母之间存在代沟，总嫌他们管头管脚，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挣脱束缚，但是一旦到了分别的时候，却是万般不舍。从办理登机手续开始，我与父母就被一道玻璃门隔开了。我知道他们站在那儿望着我，但是我却没有回头。泪水无法控制地流在我的脸上，只要回头看一眼父母，我的心就像被刀划了一下。在悲伤和迷惘中，我登上了东方航空公司飞往日本东京的班机。

由于是第一次出国，一位亲戚特地从日本来带我一起去。这次远行对于我来说有好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当我走向自己要坐的飞机时，觉得新奇和激动，毕竟是头一次呵！飞机起飞时的感觉真是奇妙，我有点紧张，看看身边的亲戚，他没有任何特殊的反应。飞机在空中飞翔着，不少乘客开始打盹，而我却兴奋、紧张地合不上眼。由于座位靠窗，我不时地向外眺望，俯视大地和茫茫云海。飞机飞临某些城市时，乘务人员会通知大家。当空姐告诉大家经过富士山时，我赶紧瞪大眼睛朝下张望，只见富士山光秃秃的，山顶的白雪在蓝天和云彩的映衬下显得圣洁而夺目。从虹桥到成田机场的飞行时间大约3小时，还没过足瘾，飞机已经开始下降了。向窗外看，日本的山河映入眼帘：被绿色覆盖的山、笔直的高速公路，以及飞驰其上的玩具般的汽车、一幢幢二、三层高的住房。这一切仿佛刚进行过大扫除一般，显得异样的整洁。

与当时的虹桥机场相比，成田机场最大的特点是清洁、一切看上去都显得井井有条。这是一座巨大而繁忙的国际空港，过往的旅客和穿着各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川流不息，但是丝毫不显得混乱，一切井然有序。机场大厅灯光通明，目力所及之处几乎是纤尘不染。很快到了边检处，日本人和外国人是分开的，各有几个通道，很快排起了长队。日本人过边检的速度很快，而外国人花的时间就要长一些。趁着这工夫，我观察了一下队伍。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的人最多，欧美人也不少，其他地区的人就比较零星了。一般来说，欧美人穿戴得体，派头十足；而大多数亚洲人衣着比较寒酸，神情局促。欧美人不少是单独行动，亚洲人则以三三两两、结伴而来的居多。担当边检工作的日本入国管理局官员对不同的外国人似乎是区别对待的：对欧美人的态度比较和蔼，放行得快，有时还寒暄两句；对亚洲人则往往表情严肃，检查护照、签证时很仔细，有时还会将对方的脸与证件上的照片做一下对照。

检查完证件后，到传送带那儿去取托运的行李。欧美人虽然人高马大，但是行李却带得不多，很少能看到拖着箱子，还带着大包、小包的。来自中国、东南亚的人虽然身材普遍瘦小，却很能带行李，不论男女，往往是一个人除了一个大箱子外，还加上几个塞得满满当当的旅行包。这方面中国人显得尤为突出，个别同胞甚至将装满物品的塑料马甲袋拎在手上，很是扎眼。通过海关时，行李越多的人得到的“关照”也越多，虽然日本海关职员的态度还不能算做刁难，但是他们对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旅客的行李特别注意，有一些人被要求打开行李进行仔细检查。与日后不同的是，当时之所以如此，并非侧重于安全、毒品等因素，而主要是所谓的卫生方面的原因。这里面的歧视，确实能够咂出味来。我看到一个中国人被要求打开旅行箱，海关职员翻检出一包土特产，先用日语、后用英语告诉他必须没收。那人起初用日语辩解，但见对方不为所动，便有些着急，声音变得大起来。而日方职员虽然始终

没有加大嗓门，但脸色也不好看，坚决不予通融。最后，从别处赶来 2、3 名海关官员，那位不走运的入境者停止了争辩，颇为无奈地看着自己的包裹留在了海关。争执中的来言去语我难得听懂一、二句，只能靠“察言观色”来“轧苗头”，好在站在一旁的亲戚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

我自己虽然也带了不少行李，但是倒没有遇到什么周折，这让我和亲戚都松了口气。等到推着行李走出机场大门，才真正算是平安无事到了日本。从机场通往各地的交通非常便捷，交通工具的种类、通行路线、车次都比较齐全，而且指示分明。从东京到横滨可供选择的交通工具有出租车、机场大巴、数条线路的电车等。就价格而言，电车最便宜，每人数百日元即可，但是车厢内人多拥挤，两个人带着大包、小包、箱子去和衣着整洁的普通乘客挤，非但不便，而且颇为难堪。出租车太贵了。机场大巴的价格每位不到 3000 日元，比较适中，而且底部能放许多行李。我们买了票依次上车后，大巴就向横滨出发了。

车内有两位工作人员，一位是司机，另一位是乘务员小姐。两人都穿着整洁、合体的制服，乘务员小姐很年轻，面带微笑，轻言慢语地向大家问候，告知注意事项。虽然我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但是那和善的笑容和轻柔的语调却让我感到很舒服。车内宽敞、清洁，设有厕所，还播放音乐。亲戚在座位上很快就闭上眼睡着了，我却因为兴奋和好奇而感觉不到丝毫困意，眼睛一直向车窗外眺望。两个多小时后，大巴到了横滨站，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司机的制服笔挺，衬衣浆洗得雪白，还带着白手套。他殷勤地帮我们放好行李，不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

亲戚家住在横滨市中区的一个半山腰上，是租住的房子，日语称为“アパート”，是一种设备相对简单的公寓，与我国的公房比较接近。亲戚家所在のアパート不过两层，每层大约有 4 户住宅，看上去显得比较简易。进门便是厨房兼餐厅，两间居室，浴室和厕所则是分开的。每间屋子的面积都不大，感觉上有点压抑。两间居室都是和式的，每间地上各铺着 6 块“榻榻米”，每块“榻榻米”呈长方形，表面用草席包裹，内部也由木板、草等填充而成。一块“榻榻米”日语称为一“畳”，6 块也就是 6“畳”，大约 8 平方米。按照日本的规矩，在“榻榻米”上是不准穿鞋的，拖鞋也不行，只能光脚或穿袜子。这是为了保养“榻榻米”，并使之保持清洁。同时，这也是日本传统居住文化和礼仪的一大体现。对于初次接触的人来说，踩在“榻榻米”上感觉轻飘飘的，老觉得脚往下陷，不过我很快就适应了。和式居室内一般不放置什么家具，代之以一面或两面壁橱，壁橱的容积很大，白天可将被褥安放于内，就寝时取出铺在“榻榻米”上就可以了。壁橱是移门式的，很轻巧，有的绘有日本式图案，很有特色。有的不做卧室的和式房间内往往摆有日式小茶桌，呈四方形，大小与国内的麻将桌相仿，只是腿的高度只及普通桌子的三分之一，便于在“榻榻米”上席地而坐。这种小茶桌的桌面底下一般都装着一个小小的电暖器，还有配套的被子。到了冬天，在桌面上铺上被子，打开电暖器，坐在坐垫上，将腿伸到桌子底下，会觉得非常温暖、惬意。这时如果一边喝着热腾腾的绿茶，一边吃着仙贝等日式茶点，再加上静冈产的蜜橘，会有一种很甜蜜的感觉。实际上有不少日本家庭就是经常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休闲时光的。

亲戚家有 4 位家庭成员，我挤在他们家多有不便。好在亲戚已经为我在附近找了房子，过两天便去看房。到日本的第一天晚上，我躺在亲戚家的“榻榻米”上辗转难眠，心中涌起的是对家乡、父母的无尽思念，以及对未来人生道路的担忧。真想马上回去啊。一瞬间竟然产生了这个念头。我怀揣 500 美元，这是全部家底了。如果独立生活的话，这只够开销 10 天的。怎么办哪。在迷迷糊糊中，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 三 初涉打工

我到日本的时间比语言学校开学早了两个星期，这有利于我尽早熟悉环境，也便于从容地安排一些事情。头等大事有两件：其一是尽快落实打工，开工赚钱，其二是早日把房子安

顿好。如果不尽快“开工”，我大概连一个月都混不下去。至于学习的事，只有先靠后了。

我出国前在上海断断续续地请人补习过将近一年的日语，最后一位女老师很年轻，当时已翻译了一本书《血型与性格》，很有点小名气。只是后来她在个人生活上遇到一些难题，情绪低落，我的补习也就此中断。我虽然已经具备了一些日语基础，却完全不足以应付一个陌生的语言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亲戚义不容辞地出手相助，在我到日本的第一个周末，他们一家陪我上街，一面散心，一面顺便寻找合适的打工机会。

我们乘地铁到了横滨西口，这里是闹市区，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车站大楼内，有数十条电车、地铁在此交汇；多条市内巴士始发站和出租车扬招点也在此附近。车站大楼内商店、电影院鳞次栉比，人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与我日后所见到的任何一个日本的公共场所一样，这里并没有因为人多拥挤而变得脏乱，依然十分清洁，而我也没有看到清洁工在随时进行清扫。人们行色匆匆，但注意举止，几乎听不到高声喧哗者。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公共厕所。整个大楼内共有 10 余处，其中有收费的，也有免费的。我记得收费厕所的标准大概是 10 至 20 日元，装潢得很是精致，还播放背景音乐，与国内五星级宾馆的厕所不相上下。免费厕所虽然在装潢上有所逊色，但同样整洁干净。客观地说，和国内的大部分公厕相比，确实有天壤之别。

在西口车站大楼不远处，便是闻名的百货公司“高岛屋”和“崇光”，不时可见过往行人中有手提两家公司购物袋的。购物袋均为纸质，高岛屋的图案是粉红色的蔷薇花环；崇光则醒目地印上了“SOGO”的标志。紧挨车站大楼的是“横滨西口五番街”，这是一条商业步行街，路面狭窄，两边是琳琅满目的商店，挤满了行人，有许多是吵吵嚷嚷的中学生。中学生们都穿着各自学校的校服，女孩子的服装很有特点：一是许多制服的裙子都比较短，在膝盖以上；二是她们的白袜子很大，特别是在脚后跟的部位，看上去松松垮垮的。不过这种制服穿在日本小女生身上很合适，凸显出她们的青春活力与可爱。

我们转了一大圈，觉得肚子空荡荡的，想吃午饭了，于是便到车站大楼的 B1 层去看看。B1 层都是饮食店，有“中华料理”、“日本料理”、“韩国料理”，也有西餐厅，还有卖牛肉盖交饭、咖喱饭，以及意大利通心粉的。最后我们进了一家名叫“一品香”的中餐馆，吃完饭到帐台结帐时，亲戚意外地发现贴着一张招募侍者的广告，于是试着问了店长。店长大约 30 多岁，中等身材，两只眼睛大大的，显得很精明。可能是第一次碰到中国人前来找工作，他一开始有些意外，朝我看了看，问了些多大啦、会不会日语之类的，然后客气地对亲戚表示现在正忙，明天下午 5 点再到店里面谈，并叮嘱带好身份证件。

我有些忐忑，觉得被雇佣的可能性不大，亲戚安慰了我一番，说试试看，不行的话再找。第二天下午我独自前往面试，由于担心找不到路，我 4 点就出门了。身上还带着个小本子，里面用日语写着“一品香”的位置和电话号码，实在找不到时可以问人。不过我很顺利地找到了“一品香”，时间还早，店里还没有人。我在附近转了转，心里很是紧张。大概 5 点不到 10 分，我看到一个穿着工作服的人前来打开店门，于是就大着胆子上去打招呼。此人正是店长，他马上认出了我。面试开始了，他问了一些问题，比如年龄、到日本来干什么、住在哪里等。一开始他说得很快，我来不及反应。他觉察到了，抱歉地笑笑，放慢了语速。虽然他说的话中有些我一点不懂，有的似懂非懂，不过重要的还是基本听明白了。这既得益于出国前的日语学习，也和来日本后亲戚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有关。在看了我的护照、外国人登陆证等证件后，他示意我等一会儿，起身走进厨房，和一位大师傅模样的老头交谈了两句，不一会儿便回来了，笑咪咪地说我被录用了。接着，他便仔细向我说明了工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以及一些注意事项等。我竭尽全力地听着，惟恐遗漏了什么。工资是每小时 800 日元，工作时间从每天下午 5 点半到 9 点半，干的是端盘子跑堂的活。店里提供一顿晚饭，支付交通费，此外还规定每个星期休息一天。店长带我到更衣室，给了我更衣箱、制服和钥匙，叮嘱我第二天必须在 5 点半以前换好衣服，准时进店工作。

第二天我5点10分就到了更衣室，换好了衣服，走进店堂大概是5点20分。店长已经到了，他笑着和我打了招呼，先领我到打卡机前，教我怎么打卡，告诉我这是进店后第一件要做的事。他说这话的时候，周围的日本人都笑了起来。接着店长介绍我认识其他员工，厨房里有4个人，一个是大师傅，大概有50来岁，另一个师傅40多岁，还有两个打下手的小伙子。他们都带着白帽，穿着白底蓝条的制服、白色的裤子、白色的工作鞋，看上去很友善。端盘子的人有好几个，都是些挣外快和零花钱的家庭主妇和学生，主妇们的出勤率比较高，学生们不常来，跟我这个恨不得天天上班的中国学生恰成对照。每天晚上在外面端盘子的有2、3人，一般是我和一、二位家庭妇女搭档，这些“欧巴桑”们曾带给我不少烦恼。

“一品香”的店堂面积不到30平方米，10余张桌子，是那种价廉物美的快餐式“中华料理”店，供应的都是那种日本人爱吃的大众菜肴和点心，如炒韭肝、咕咾肉、日式煎饺、日式烧卖、炒饭、盖交饭、汤面等，食客基本上是上班族和在附近购物的人。流动量大，生意繁忙。由于我是一个新手，何况还是一个日语不大熟练的外国人，因此店长一开始没有安排我点单，只叫我端菜收盘子。这样一来，和我搭班的人就比较吃力了，尤其是在客人多的时候。“欧巴桑”们对此很有些抱怨，却苦于和我说不明白，便经常做出些脸色给我看看，有时嘴里还嘀嘀咕咕的。而我呢，对那些“欧巴桑”们也看不顺眼，当时国内的妇女一般都是素面朝天，年轻女子都不在脸上涂抹，更何况上了年纪的人呢？我觉得这些浓妆艳抹的日本“老太”看上去很象《白雪公主》里的巫婆，因此不大愿意主动和她们进行交流。好在店长始终对我和颜悦色，厨房里的那些伙伴们也很友好，渐渐地心情也就比较放松了。自己一面努力学习日语，一面好好干活，尽量避免出错，对“欧巴桑”们则客客气气，敬而远之，不要让她们抓到什么错处。过了一些日子，一些“欧巴桑”对我和善多了，但也有人不肯放过我，其中有一个特别讨厌，有一天终于发生了冲突。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店里生意很忙，跑堂的只有那个“欧巴桑”和我，她对我始终绷着一张脸，而我则像一个小媳妇般地小心翼翼。我那时已经能够点菜了，所以和“欧巴桑”倒也互不相扰。她对我摆出的那张臭脸，忙起来也就看不到了。不过我终究是个初来乍到的新手，语言又没有完全过关，有时客人和我多说两句，我就听不懂了，只能在一边傻笑，又不敢去请那位“欧巴桑”来解围。终于点错了一道菜，客人不高兴了，于是“欧巴桑”陪着笑脸和客人解释了一番，大意是说我是个中国人、还是个孩子，请多加包涵之类的话。客人倒也释然，把那道不曾点过的菜认了下来。“欧巴桑”转过脸对我大声呵斥起来，这个平日几乎和我不说话的老妇人，终于逮着了一个“修理”我的机会。店里正忙，她发了一会儿威风后也就暂时告歇了，但足已让我感到十分沮丧。由于心情不佳，不一会儿我再次出错，将一道菜上错了桌子。本来这并不是件大事，只要客人及时指出，我再端回去就行了，但客人可能没在意，菜一上桌就吃将起来。而点菜的客人久等不来，便去向“大堂经理”，也就是那位“欧巴桑”反映，她更怒了，我听到她嘴里开始“八噶、八噶”地不干不净起来。我的怒火“腾”地一下窜了上来，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欧巴桑”们有时也会忙中出错，她凭什么骂我“八噶”？！由于我算是“新人”，更何况日语还不太利索，组织不起有效的“回击”，便决定“以颜还颜”，用老婆子们惯常对付我的手段反击她。于是我的脸也拉长了，看上去气吼吼的。一老一小就这样一直绷到下班。

下班后，意犹未尽的“欧巴桑”到店长那里去告了状，店长带着纸和笔来找我“谈心”了。他惟恐我不能全部听懂他的话，所以和我谈话时一般都带着纸、笔，随时准备“笔谈”。“欧巴桑”们平时对我的腔调他都看在眼里，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劝了我一番。他说日本人讲论资排辈，早进职场一天，就有资格教训“新人”，所以“欧巴桑”们“指导”我是很自然的事，应该接受。我说我并不是不接受指导，而是反感她们对我的态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她们才那样对我？店长听后笑了起来，在纸上写了几个字递给我。我一看还真是没想到，竟然是“日中友好”4个字。见我表情错愕，他解释说他自己绝对不存在国籍差别

意识，“欧巴桑”们应该也不会，之所以有误会，主要还是语言沟通上的问题。他半开玩笑地说：葛涛君，你要努力呀，好好学习日语，好好工作。就像日本电影中时常会出现的对白一样。我有些好笑，但感到他确是一番好意，便也爽快地答应了一声：“哈伊”。眼看“思想工作”的效果不错，店长也高兴起来，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如果那些老婆子们再欺负人的话，告诉他就成了。

不过，我在“一品香”也不可能干得再长久了。由于从亲戚家搬出去单过，我每个月的基本开支就得7万日元。语言学校每半年得交20余万的学费，还得准备钱考大学，而现在每个月打工的收入才10万日元多一点，肯定是不够的。我得换一份工作时间更长的活。当我向店长提出不干的时候，他劝了我半天，说我年纪还轻，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上。作为一个非亲非故的日本人，能站在我的角度苦口婆心地劝说我，让人非常感动。但是，他并不了解中国留日学生的生存状态，我也没有必要在他面前诉苦。于是，我辞去了到日本后的第一份工作，来到了下一个打工地点。

#### 四 何处是家

我刚到日本时，暂时栖身在亲戚家。他们家4口人，居室不过两间，并不宽敞，我必须尽快另找住处。到日本的第3天，亲戚就带着我在附近看房了，他的意思是希望我住得离他近一点，便于照应，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急于找房子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亲戚想赶我走，而是考虑到一旦开学、特别是开始打工后，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去看房子了。

亲戚委托的房产中介商就在附近，临街开着，门面很小。他自己的房子就是委托这家找的。外国人在日本找房子不容易，中国人就更难了。日本人不愿意租房子给中国人有种种理由：做饭起油锅、不按规定扔垃圾、不懂得养护“塌塌米”等等。许多初来乍到的中国人都为租房子的事情苦恼过。由于和亲戚相熟，这家中介商的服务还是比较周到的。一个满脸堆笑的小老头开着一辆破旧的小车带着我们看了周边的几处房子，还详细地介绍了每处的情况。

公寓条件比较好，一般都带独立的厨房、浴室和厕所。哪怕居室面积只有6个平米，这些设施也是齐全的。但是公寓的租金昂贵，当时横滨的行情一般是每月5万日元以上。“アパート”是一种比较简易的住宅，通常比较陈旧，设备也差。当然“アパート”也是分等的，月租超过5万日元的一般还算不错，大多带有浴室。4万多日元的就危险了，低于4万日元的基本上是没有的。日本人有每天洗澡的习惯，住处没有浴室是很丢面子的事。被迫住在如此蹩脚的房子，不是经济状况不佳的独居者，便是学生，再有就是外国人了。

亲戚给我借的房子每月租金3.5万日元，底楼，有厨房、厕所，没有浴室。一间卧室有6“畳”“塌塌米”大，两面墙上都是很大的移窗，一面做了移门式壁橱。房子虽旧，倒还整洁，卧室本来就是朝南的，加上两面墙上的移窗，所以光线充足，十分暖和。我们一次付给中介17.5万日元，其中包括两个月的租金7万日元、给中介的礼金3.5万日元、押在房东处的保证金和押金各3.5万日元。

虽然我给了房东14万日元才住进了这所没有浴室的房子，但是吝啬的房东除了一台煤气灶和几盏电灯外，没有提供任何生活用具。除了自己的被褥衣物，以及亲戚给的一些碗筷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虽然住了进去，却还不得不在亲戚家暂时搭伙。从哪里才能弄到那些必需的家电、用具呢？买？没有那么多钱。送？没有人给我。合法的途径只有一条：捡。当时日本尚未对家庭丢弃大件物品进行规定，在各垃圾收集点经常可以看到被扔掉的各种家电和家具，据说大部分尚能使用。刚到日本的中国人中，不少就是靠这种方法添置生活用品的，我看来也得这样了。虽然捡东西不犯法，但终究不是光彩的事情，只能在晚上人比较少的时候干。于是，在社区规定丢垃圾的那天晚上9点，亲戚家3个大人就帮我一起去“拾荒”了。日本的居民区一到晚上十分安静，除了个别晚回家的上班族之外，很少有行人走动，便于我们从容地挑拣可用的东西，然后搬回家。我们4个人徜徉在几个垃圾收集点附近，挑拣

着、比较着，找到合适的东西后一齐搬回去。日本人将许多半旧不新、或者有些毛病的家电、家具当作垃圾处置，收集点被堆得满满的。从9点钟一直到11点半，4个人从几个垃圾收集点到我的住所往返几次，折腾得筋疲力尽，才算“大功告成”，电冰箱、电视、电风扇、电饭煲、小茶桌、座椅等全部进了家门。这几件东西中数冰箱个头最大，搬起来最费力，一位女亲戚在帮忙搬它的时候，手上的戒指被划出几道印子，害得她回去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检查这些“战利品”，发现除了电视机因为没有天线而看不清楚外，冰箱、电扇、电饭煲都是好用的。我方才感到，在上海听到的一些关于在日本“拾垃圾”的传闻，还是比较可信的。

这次“行动”后不久，横滨市政府就出台了规定，不允许居民将废弃的大家电、家具随意丢在街上，我算是搭上了“末班车”，拣了个便宜。不过没多久，我连每月3.5万日元的房租都觉得承受不起，和语言学校的两位同学一起合租了一间更便宜的房子，这些享用了没几天的“战利品”自然无法带去，被作为垃圾处理了。

第二次搬家的经历颇为辛酸。之所以搬离亲戚为我找的房子，唯一的原因就是租金贵。我当时还在“一品香”打工，每月的收入刚超过10万日元，要拿出1/3来付房租，手和心都会觉得发抖。亲戚也明白这个情况，但是他觉得自己找太差的房子有点说不过去。语言学校开学后，除了生活费之外，我也切实地感受到了学费的重压。此外，我没有忘记到日本上大学的目标，而从报考开始一直到踏进大学校门，也需要一大笔钱。除了靠打工积攒，我没有其他的“生财之道”。我辞掉了“一品香”的活，在中华街的一家饭店里重新“上岗”，虽然每小时比原来少了50日元，但是由于劳动时间延长，每个月可以到手18万日元左右。除了“开源”，还得“节流”，这方面的大头就是房租了。正好我的两个同学也在寻找同租的伙伴，他们的房子每月租金不到3万日元，于是大家一拍即合，我决定立刻就搬过去。

亲戚对我的举动是不赞成的，他很不高兴。在我搬家的那天，他基本上是一个旁观者，而即将成为室友的两个人也不会请假来帮忙，我只能靠自己了。好在我的家当很少，一个大旅行箱、两只旅行包，以及几个马甲袋就可以全部装下了。我记得那天晚上下着雨，已经是11月中旬了，很有点冷。亲戚绷着脸替我叫了辆出租，司机下车本打算提行李，一看这情形嘴里立刻就嘀咕上了。我将写着地址的纸条递给他看，他虽然开始说不知道该怎么走，不过后来倒是没有拒载。车子行驶在路上，雨越下越大，司机默不做声地开车，我简直想大哭一场。目的地渐渐到了，司机转过身来跟我搭话，他说门牌号码不清楚，让我打个电话问一下。我老实告诉他，住处没有电话。他一听，又嘀咕了一通，无非是说找不着之类的话。发泄了一会儿，他觉得和我这个日本话都说不利落的外国人不便纠缠下去，于是要求我下车。当时的情形，我就是想投诉他也说不明白。他在一家24小时便利店的门口放下了我，我便和自己的几件家当一起站在了雨里。几只装杂物的纸袋很快被雨打湿，我眼望着匆匆过往的陌生人，心头充满了无助和孤独，我真的后悔自己为什么要离家万里，来到这个地方？

正当我彷徨在雨中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朝我走来。他走到我跟前停了下来，和我搭话。我一听来人说的是中文，简直象是抓到了一棵救命稻草。这人原来和我是一个学校的，也住在附近，此时正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我和几只箱子、包裹站在一起，手里还提着几个被雨水打湿了的袋子，就猜到可能是一位落难的同胞。多亏他把我领到了新的住址，还和我一起等室友下班回家。这位同学姓张，广西桂林人，那天如果不是遇到他的话，我会吃不少苦头的。

我的“新居”离神奈川大学很近，是一栋临街的二层“アパート”。举目望去，它算得上是视野内最简陋、陈旧的住宅了。可是与房子的内部相比，它的外观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金玉其外”。每一层有八间屋子，面积既有6“畳”的，也有4“畳”半的。每一间屋子里配一个自来水斗和一个煤气灶，连厕所都没有。整栋楼只有一个公共厕所，设在底楼，时常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在日本竟会住进这样的房子，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但房租确实是便宜的，我们3个男人同居一室，每人每月连8000日元都不到。

和我住在一起的两位室友是同班同学，也是上海老乡。他们两人都已年过 30，一个从前是中学老师，另一个是个体户。可能因为岁数相近的关系，他们两人颇有些共同语言。4 “ 畳 ” 半的房子，一到晚上 3 个男人往下一躺就没了插足的地方。大家各自买锅烧饭，锅碗瓢盆、油盐酱醋都分得清清楚楚。因为打的工不一样，所以作息时间也不相同，彼此都得十分小心。为了节省每一块日元，3 个人就这么苦苦地熬着日子。不多久，那位个体户朋友变得诡秘起来：每天回家都是深更半夜，成天西装革履，还把头发弄得油光乌亮。我和教师议论了几次，觉得里面一定有名堂。没多久，个体户干脆向我们挑明，原来他是到色情场所做 “ 三陪 ” 去了。出了这么一个晨昏颠倒的家伙，其余两人不免受到影响。我就碰到过两次。一次是大白天进家门，见他和一个女人混在一起，彼此很是尴尬。另一次就比较危险了，也是在大白天，他想炖点骨头汤补补身子，结果锅还在煤气灶上，人却睡着了。等到我进房门的时候，汤已经烧干，他却鼾声依旧。事后他说我救了他一命。我和教师虽然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对他可是怨极了。

这位 “ 三陪男 ” 天天半夜摸着黑回家，自然是希望一进门就倒头便睡，但我却是要熬夜读书的。看来我们得分开了，恰巧对门的房客这时走人，我和房东一商量就搬了过去。这时我打了几个月的工，手头攒了点钱，贵就贵些吧，自己可以不受干扰地学习了。过了不到两个月，两位前室友突然搬走了，临走连个招呼也不打。虽然我们已经解除了 “ 同居 ” 关系，但还是同学，天天上课还碰得到。这两个人见了我却冷冰冰的，让人感到纳闷。后来，房东告诉我，住在这里的其他日本人不知什么时候注意到了 “ 三陪男 ”，向她投诉。我知道这不是真正的理由，我们 3 个人合租一间房一直是房东的心病，她从来就没有正式认可过。我分出来单过，表明营垒内部开始瓦解。房东抓住了这个机会，逼两人散伙，变相地将他们赶走了。这就是他们对我 “ 横眉冷对 ” 的真正原因。

我一个人住在 6 “ 畳 ” 的屋子里，心情固然是舒适了，日子却依旧难过。当时已是 1991 年的 1 月，正是日本寒冷的季节。我将从上海带来的一床被子铺在 “ 塌塌米 ” 上，另一床被子和一条毯子盖在身上。这显然是不管用的，无论躺着、坐着，还是站着，我都会禁不住冷得打哆嗦。有一次我在家时，正逢房东前来巡视，看见了我的被褥。好心的房东告诉我，就靠这些睡在 “ 塌塌米 ” 上是过不了冬的。她说要送我一些御寒的东西，晚上就拿过来。晚饭后，老夫妻俩开着车来了，给我带了好些东西：一床又大又厚的垫被、一张装有电暖器的日式小茶桌，以及一床铺在上面的厚被子。房东夫妇特地告诉我，这些都是送给我过冬的。我体会到了 “ 雪中送炭 ” 的感觉，全身涌动着暖流。他们的赠品，我一直使用到回国。

住在这栋 “ アパート ” 里的，绝大多数是日本学生，其中又以附近的神奈川大学的学生居多。这些学生大都家境一般，有的人很有意思。住在我隔壁的一位很爱交朋友，经常男男女女的带回好几个。 “ アパート ” 的隔音本来就不行，何况这是一栋旧屋呢？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忍一忍算了。但是，随着他开始频繁地带女伴回来过夜，我的忍耐也就到了头。怎么办呢？当面和他说吧，毕竟难以启齿。我只能告诉房东，请她解决。房东是怎么跟他说的我不知道，不过此后他收敛多了。住在我对门的那位倒是从未有过 “ 男女关系 ” 问题，可却是个不讲理的人。他是个空手道爱好者，喜欢在房间里练练身手。手脚一动，他的嘴也闲不住了，开始大声地发出 “ 呀、呀 ” 的喊声。他还有一个毛病：听收音机时音量调得很大。面对如此吵闹的家伙，我还是 “ 逆来顺受 ”，不予理会。可这家伙很有点 “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 的脾气，有一天早上我的收音机音量大了一点，他便 “ 啪啪 ” 地敲门。开了门，他微微欠了欠身，先说收音机的声音大了，接着又说在日本不能那么自行其事。后面的话激怒了我，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自己才是一个噪音制造者。我说有意见的话找房东投诉好了，说完便关上了门。两天后，房东打电话给我，说要调解我们的误会。听房东的口气，那家伙气得不小，很让我开心了一阵。

我在这里一直住到考上大学。进入关东学院大学后，我住进了神奈川县国际学生会馆，

生活、学习的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